

AMERICAN ASSESSMENT

美国的绥靖政策

1933—1938年

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

〔美〕阿诺德·A·奥夫纳 著



商务印书馆

美国的绥靖政策

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

〔美〕阿诺德·A. 奥夫纳 著

陈思民 余昌楷 译

丁 钟 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87年·北京

Arnold A. Offner
AMERICAN APPEASEMENT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GERMANY,
1933—1938

根据美国纽约 W·W·诺顿出版公司 1976 年版本翻译

MÉIGUÓ DE SUÍJÌNG ZHÈNGCÈ
美国的绥靖政策
1933—1938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德国
〔美〕阿诺德·A. 奥夫纳 著
陈思民 余昌楷 译
丁 钟 华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三河县二百户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755

1987 年 3 月第 1 版	开本 787 × 1092 1/32
198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250 千
印数 2,300 册	印张 12 1/4

定价: 1.80 元

译者前言

希特勒 1933 年 1 月 30 日上台后，便实行扩军备战政策。从 1936 年德国进军莱茵兰时，英法政府就步步退让，后来以张伯伦为首相的英国政府和以达拉第为总理的法国政府，推行了臭名昭著的绥靖政策，1938 年 9 月 29 日他们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上签字，就是一个铁证。在英法政府的纵容下，希特勒欲壑难填，终于在 1939 年 9 月 1 日向波兰发动进攻，从而拉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帷幕。

对于英法两国从 1933 年至 1938 年对希特勒德国采取了绥靖政策这一见解，国内外史学界并无多大分歧。但是，这一时期美国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史学界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根据近几年来已发表的部分文章来看，我国史学界对这一问题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的政策与英法两国的不同，英法是把绥靖政策作为欧洲的政策纲领去推行的，因而直接地鼓励了法西斯的侵略扩张；美国则是以“中立法”作为它外交政策的纲领的，罗斯福与张伯伦不同，他是为“中立法”所制约的，但他又同中立主义进行了斗争。罗斯福在判断三十年代国际形势上是有远见的，他是确立美国反法西斯政策的旗手。另一种意见认为，美国在“中立”的旗帜下执行了绥靖政策，美国的绥靖政策从表现到后果同英法的并无二致。罗斯福是美国绥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其目的是要推

动欧洲的政治、军事形势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迫使美国的各个对手卷入战争并在战争中削弱,从而确立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立论,其所根据的史料都显得不够充分。

在美国,大多数学者对这一问题都采取回避态度。例如,1963年纽约出版的A·迪康德的《美国外交政策史》在谈到三十年代美国的欧洲政策时,只是轻描淡写地把它说成是避免美国“同欧洲发生政治纠葛”的“孤立主义信念”,缄口不谈美国执行了绥靖政策。又如,1969年出版的H·B·帕克斯的《美国通史》在谈到这一问题时则称,“在战争实际爆发前近两年的时间里,罗斯福和赫尔一直在寻求遏制战争趋势的办法,他们认识到绥靖政策是徒劳无益的。”

本书作者奥夫纳大量地引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军缴获的、现存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德国外交部文件、美国国务院档案以及美国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的私人函件,特别是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参加日内瓦裁军谈判的美国代表团团长戴维斯、美国驻柏林大使多德以及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菲利普斯、梅塞史密斯、莫法特等人的私人信件、日记,得出结论说:1933—1938年美国对欧洲事态发展的态度,“站到了领导失误的绥靖政策一边”。美国的立场是:“如果能避免战争,付出任何代价几乎都不算太高。”作者认为,在德国退出国联时,美国本来可以敦促英法两国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而不应该退缩并发表一项不卷入欧洲政治问题的公开声明;在意大利进攻埃塞俄比亚期间,美国没有采取敢作敢为的立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表现了难以置信的政治盲目性,走得比它的中立法的

法律要求还远;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美国虽然感到它的重大利益受到了威胁,但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问题;1938年美国在承认意大利占领埃塞俄比亚的问题上举棋不定,而这种承认正是张伯伦绥靖政策的核心;在慕尼黑危机期间,美国的外交家们的表现并不比其他任何人更具有洞察力和远见。罗斯福也认为应“把原则上同意给希特勒的东西奉送给希特勒”,赞成“和平地移交苏台德”。没有任何外交文献表明,罗斯福的助手们不同意慕尼黑的解决办法。从罗斯福到赫尔和韦尔斯,一直到国务院、国会和各阶层的人士,除极少数例外,一直持有这样一种看法,即欧洲的问题是欧洲的;把欧洲出现的危机看作是遥远的国家和他们所不了解的人民之间的事情。当战争在欧洲开始时,美国人天真地声称:他们置身事外。

奥夫纳的书出版后,在美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评价颇高。《美国历史杂志》认为,奥夫纳的作品“是目前大量问世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德关系的同类书中较受欢迎的一本,……是一部扎扎实实地经过创造性研究的作品,它填补了现有文献的一大空白。”《美国政治科学院年刊》评论说,“奥夫纳先生对1933—1938年欧洲危机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第一次作了全面的研究。他的书以极为广泛的资料作基础,详尽地描写了在绥靖德国的过程中美国所起的作用以及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事件,该书在这个方面堪称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书刊对这本书的这些评论不算过分。但必须指出,作者在书中只是列举了美国推行绥靖政策的一系列事实,却没有揭示出美国推行这一政策的经济、社会原因,而只是把

它归结为少数政策制订者的政治素质和个人修养，因而往往不能说明问题的本质。

作者阿诺德·A·奥夫纳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1964年在印第安纳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63年至1968年在锡拉丘兹大学任历史讲师，1968年以后在波士顿大学任历史教授。著有《美国和英联邦》（1966年）、《战争的教训》（197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1917—1941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与世界政治》（1975年）、《绥靖政策的再探讨：1933—1940年的美国、英国和德国》（1977年）等书。

本书所引资料非常丰富，并附有资料短论，篇幅甚长，自原书第283至309页，中译本未予译载。原书脚注均照译，不注“著者”字样；译者所加脚注，均说明是“译者”所加。

罗凤礼同志发现并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的原著，朱贵生同志为本书的译者前言提了宝贵的意见，李国麟同志帮助翻译了部分德文名词，在此均表谢忱。

译者

1984年5月6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好景不长	4
第二章 裁军失败	25
第三章 关系日益恶化	71
第四章 已清与未清的帐目	100
第五章 侵略来临	138
第六章 好邻人和坏邻人	172
第七章 拒绝邀请	224
第八章 最后的机会	273
第九章 走向慕尼黑和战争	312
索 引	359

序 言

内外危机四伏,似乎是近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状况,而这种状况尤其是三十年代的特点。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政府从就职的那个时刻起,就面对着大萧条带来的种种后果以及德国和日本向世界安定所提出的挑战。研究这个时代的史学家们往往首先把他们的兴趣集中在1933年至1938年的国内改革上,只是到了后来才把全部注意力转向外交问题方面,尤其是转向那些促使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事件。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并没有坐等其他国家缓和它们的国内问题。因此,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至1938年间,不得不去应付接二连三发生的危机;这些危机先是破坏了欧洲的安全,最后终于又破坏了美国的安全,并且对造成不久即席卷世界的那场灾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美国来说,“德国问题”既是棘手的,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二十年代,美国人曾经不遗余力地利用外交手段和美元把德国重新纳入西方政治和经济的大家庭,而德国的外交家们则强调保持与美国的良好关系乃是修改凡尔赛和约和改变欧洲均势的一种手段。

我们从历史的记载——还有大量的回顾——中可以看出,希特勒的上台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得势,很快地使人们对新老问题的许多传统的看法变得不伦不类和风马牛不相及了。

当时，正直之士对于他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和需要的解决办法，能够提出而且也确实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历史的记载也表明，某些人比其他的人有先见之明，而美国和欧洲的外交家们，由于种种原因，却坐失时机，未能扭转事态使之朝着有利于他们的一代和后代的方面发展。本书就是叙述 1933 年至 1938 年的欧洲危机期间，美国在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中起了作用的这段历史。

许多人士和机构对于我的研究工作和写作给予帮助，谨此致谢。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我研究这位总统的以及 R·沃尔顿·穆尔的文件提供了方便；引用穆尔的文件是得到费尔法克斯·S·麦坎德利什夫人的许可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助我查阅国务院的档案；国会图书馆手稿部的工作人员协助我，让我使用了大量的藏稿。玛萨·多德慷慨地让我引用她的父亲威廉·E·多德的文件，哈佛学院图书馆也准许我引用杰伊·皮尔庞特·莫法特和威廉·菲利普斯的文件。特拉华大学图书馆允许我引用乔治·S·梅塞史密斯的文件，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允许我引用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的文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允许我使用西奥多·J·马里纳的文件，还有口述历史资料馆允许我使用克劳德·鲍尔斯、威廉·菲利普斯以及约翰·C·怀特的资料，我均在此表示谢意。纽约大学图书馆的塔米门特图书馆让我随便使用巴鲁克·查内·弗拉德克的文件，并承蒙纽约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和阿斯特、莱诺克斯和蒂尔登各基金会允许我引用联合抵制委员会的文件。老巴里·宾厄姆还允许我引述罗伯特·W·宾厄姆的话；帕特丽夏·鲍尔斯允

许我引述克劳德·鲍尔斯的话;杰克·I·斯特劳斯允许我引述杰西·斯特劳斯的话;以及小休·R·威尔逊允许我引述休·R·威尔逊的话。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为他们的一个邻居提供了许多有时很难找到的书籍,而锡拉丘兹大学图书馆则购买了很多盘缩微胶卷供我特殊需用。

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为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笔夏季补助金。此外,锡拉丘兹大学的马克斯韦尔研究生院和保罗·H·阿普尔比研究基金会也给予资助。锡拉丘兹大学还慷慨地给我一学期的假期让我完成我的写作。

哈佛大学的欧内斯特·R·梅对我的原稿提出了有创见的、令人深思的评论;哈佛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编辑马克斯·霍尔几年来提出过明确的意见,鼓励我坚持到底。

印第安纳大学的罗伯特·H·弗雷尔对我的帮助是无法估计的,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从他的渊博的知识和他的语言才能中受教匪浅;我能够跻身于这些学者之中,殊感荣幸。他审阅并修改了我的书稿,所花费的精力,比我原先希望麻烦他的要多得多。而且他的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良师益友的情谊,使我无限珍惜。

我还要感谢我的女儿德博拉,她的到来使我在完成这部著作时要比我原来预料的困难多得多,但是这完全是值得的。如果没有我的妻子艾伦的帮助,我简直难以想象我是否能够写下去,她的编辑才能和从未稍减的兴致,在本书的每一章节中都有所体现。

书中的事实如有出入,观点如有错误,概由我负责。

第一章 好景不长

1 这封信确是不易下笔，特别是对于一个在四分之一的世纪里从事本国外交工作的人来说，更是难事。然而没有回旋的余地。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维茨·翁德·加弗伦任德国驻美国大使已经五年多了，正如他向他的上级所表白的那样，他代表德国事业可谓鞠躬尽瘁、问心无愧了。到了1933年3月，世界正跨入一个新时代。普里特维茨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即将来临的变化，并且认识到他不能再起什么作用了。他通知德国外交部长康斯坦丁·冯·牛赖特说，他在美国已不能再顺利地发挥作用，因而要求解除他的职务。他提醒牛赖特说，一个人“写这样一封信时的心情是不会轻松的”。^①私下里，他希望德国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他的同僚利奥波德·冯·霍施和罗兰·科斯特也能够步他的后尘，作为对纳粹政权的一种谴责。^②

外交界中对于普里特维茨的离去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纽约时报》3月20日就他的辞职发表了几段平淡的报

① 普里特维茨1933年3月11日致牛赖特信，美国国务院：《1918—1945年德国对外政策文件汇编》，C编《第三帝国：第一阶段》，五卷本，（华盛顿，1957），第1卷，第147—148页。

② 弗里德里希·冯·普里特维茨·翁德·加弗伦：《彼得堡与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活动》（慕尼黑，1952），第228页。

道；编辑们感到高兴的是，汉斯·路德这位出任新大使的德国前总理、最近才辞职的帝国银行董事长，主张采用以黄金为后盾的稳固通货。他们说，任命这样的人出任大使，“有力地说明了德国的新政权并不打算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任何惊人之举或做出轻率的行动。”²

阿道夫·希特勒任命路德出任大使，在某些方面的确预示着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变化。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九年，希特勒在他的一次夸夸其谈的谈话中声称，在他担任总理后不久和路德的一次谈话时，这位当时的帝国银行的董事长为德国加速重整军备而愿意拿出来钱为数之少，使他大为吃惊。他警告路德说，由于他们显然不能合作，他决不能容忍反对派，必要时，他将把他“革职”。希特勒回忆说，此后不久，他采纳了帝国总理府国务秘书奥托·梅斯纳的建议，向路德提出要他出任这个大使职务；他接受了这个职务，另外还拿到了一笔退职津贴。^①路德本人后来说，他在1933年就认识到，他在国内已经不起什么作用，因此，希望在华盛顿能够有所作为。梅斯纳回忆说，路德放弃了他在帝国银行中的权势显赫的职位是“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的”。^②不管怎样，希特勒任命希尔马·H·G·沙赫特这个对德国重整军备费用非常赞同的生财有道的人物出任帝国银行董事长的道路，业已扫

① 《希特勒秘密谈话录》，1942年4月22日的谈话内容（纽约，1953），第349—350页。

② 汉斯·路德：《无党派政客：回忆录》（斯图加特，1960），第420—421页；奥托·梅斯纳：《艾伯特—兴登堡—希特勒手下的国务秘书：1918—1945年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路》（汉堡，1950），第270页。

清。^①

美国人觉得很难相信 1933 年初发生的种种变化,甚至包括希特勒的上台在内,能够具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在整个二十年代期间一直是友好的,在寻求解决棘手的国际问题的办法方面往往是富有成果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激起的反德的歇斯底里,在战后不久便消停下去了。

- 3 关于凡尔赛和约的争论刚停止,美国人就开始怀疑德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负的责任了。不久,象艾伯特·杰伊·诺克的关于《一个民族有罪的神话》(1922 年)这样的一些著作便问世了。该书把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法国和俄国;而约翰·肯尼思·特纳的《会重蹈覆辙吗?》(1922 年)一书则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为了保护华尔街而把美国引向战争。1923 年 12 月,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自由派的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欧文,发表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演说,它就象诺克的著作一样,指责法国和俄国是造成 1914 年那次灾难的罪魁祸首。^②哈里·埃尔默·巴恩斯的《世界大战的起源》(1926 年),更是超过其他著作,它坚持认为战前的德国不象三个协约国——英国、法国和俄国那样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或帝国主义的国

① 实际上美国官员对于这次变动并不感到意外。希特勒上台三天后,美国驻柏林临时代办阿尔弗雷德·克利福思就报告说,沙赫特曾对他说:他要出任帝国银行的董事长,路德将被迫让位。克利福思 1933 年 2 月 2 日致赫尔的信件,国务院档案,第 862.00/2894 号,国家档案馆,华盛顿;此后国务院未发表记录,简称为“国档”,后接档案号。

② 《国会记录》,第 68 届国会,第 1 次会议,第 65 卷,第 1 部,第 355—399 页,如塞利格·艾德勒引文“战争罪过问题与美国人的幻灭,1918—1928 年”,《近代史杂志》,第 23 卷,(1951 年 3 月),第 9 页 61 注,第 15 页。

家。西德尼·B·费伊的两卷本《世界大战的根源》(1928年)的说法比较公允,但总的说来还是对德国有所偏颇。^①到了二十年代末,德国在美国的声誉还是比较好的。

在对战争情况以及巴黎和会的一片怀疑声中,许多德籍美国人充分地利用了时机。在美国人数最多的外国出生的这个民族,由于在战争期间受到粗暴的对待,现在组织了象“美国斯托本协会”这样一些团体。这个协会发展很快,它强调德国移民对于美国制度所作的贡献,并且散发文献。该协会重新出版了艾伯特·B·福斯特的《美国的德意志成分:专论其在政治、道德、社会和教育中的影响》(1927年)。这是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两卷本著作,吹捧德意志人对于美国的许多事业所作的贡献,如废除奴隶制、文官制度的改革、稳定货币、举行和平会议和争取个人的自由等。

这个时期从德国送回的外交报告令人非常鼓舞。早在1919年1月,国务院派往柏林的一个特别使团的团长报告说,德国人诚恳地想要恢复战前的关系,并且希望美国人能够⁴捐弃战争的前嫌,为德国提供足够的经济援助以进行建设。^②1922年2月(这是1921年8月21日美国和德国谈判柏林条约之后,该条约使美国人获得了凡尔赛和约的全部好处但不承担任何义务),美国任命阿兰森·B·霍顿为驻德大使,这

① 费伊的著作主要以德国的外交档案为根据,《欧洲内阁的伟大政治》,四十卷本(柏林,1922—1927)。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均不曾发表过任何与之相当的文献;费伊在1930年的修订版的序言中说,他们最近的出版物对于他的叙述或结论并没有作重大的改动。

② 美国国务院的埃利斯·洛林·德莱赛尔的报告《1919年美国的外交关系文件:巴黎和会》,十三卷本(华盛顿,1942—47),第2卷,第132—170页。

就意味着对德国重新发生兴趣。霍顿是科宁玻璃厂的董事长和共和党竞选运动财源的重要捐助者，曾在哥廷根大学当过研究生。他对德国人的观点寄予同情，对恢复贸易感到兴趣。^①实际上，英国这个时期驻柏林大使在他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美国在德国的商人是“亲德的”，他们对于德国应承担这次战争的责任一事表示怀疑，实际上，不赞成德国必须偿付即便是减少了的赔款。^②霍顿到任大约六个月后确实担心，因为激进团体煽起人民反对赔款、反对西方国家的情绪已经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这个国家在走向独裁，而且“我看人民在逐渐变得疯狂起来。”^③但是，到1925年他离开柏林去伦敦担任新职时，他却深信军国主义在德国已经不复存在，德国只是寻求经济复兴，以便成为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④

继霍顿之后，于1925年至1929年担任驻德大使的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发回热情洋溢的报告说，德国已从独裁变为民主。舒尔曼曾任康奈尔大学校长近三十年，对德国的学术问题非常感兴趣。前不久，他在被内战弄得四分五裂的中国当公使。对比之下，魏玛共和国——他在这个共和国的

① 罗伯特·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的德美关系》（柏林—达莱姆，1965），第12—13页。另见戈登·A·克雷格和费利克斯·吉尔伯特合编的《1919—1939年的外交家们》（普林斯顿，1953）第305页中的德克斯特·珀金斯的《国务院与美国舆论》一文。

② 达伯农子爵：《一个大使的日记：拉巴洛致道威斯》，三卷本（纽约州加登城，1929—1931），第2卷，第75页。

③ 霍顿1922年11月21日致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的信件，引自默洛·J·普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二卷本（纽约，1951），第2卷，第580—581页。

④ 塞利格·艾德勒：《孤立主义者的推动：它在二十世纪的反应》（纽约，1957），第176页。

政界领袖和工业巨头中间都能应付裕如——显然具有吸引力。1925年9月，舒尔曼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保罗·冯·兴登堡总统和其他重要的官员们曾热情地接见他；双方关系“极为亲密和友好。我对德国人极表同情，对他们的成就深为钦佩。”^①德国的作法“甚为得体”。官员们和公民们都在为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工作着，“整个国家今天看起来就象一座花园。”^②1926年3月，舒尔曼向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报告说，德国外交部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不仅是国务活动家，而且也是有远见的政治家、有作为的政党领袖。”^③舒尔曼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的学者和德国各大学重新拉在一起，并劝说美国的金融家们对德国的企业进行投资。1928年11月，他对纽约商会说，鼓吹德国实行社会主义化或恢复原来的帝国，注定是要成为“荒野里孤独的呼声”。他坚持认为激进主义决成不了什么气候。^④

在整个二十年代期间，德国人一直在寻求美国的友谊；这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他们作为挫败法国人进行报复的一种手段。早在1921年春天，德国政府就建议由美国来确定赔偿的款项，但是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拒绝了，尽管他在找

① 舒尔曼 1925年9月16日致卢斯·米尔黑德牧师的信，《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书信集》，《地方历史文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纽约伊萨卡。

② 舒尔曼 1925年9月16日致弗兰克·西里的信，同上出处。

③ 舒尔曼 1926年3月9日致柯立芝的信（副本），同上出处。另见戈特瓦尔德：《施特莱斯曼时期》，第105页。

④ 1928年11月1日演说词；《舒尔曼文集》；另见艾德勒：《孤立主义者的冲动》第，177页—179页。